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

周亚婷

摘要: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再次经历了历史转型,即主要由原来模仿日本而转向全面学习美国,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最后整个中国近代体育的完成。本文在阅读大量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考察报告和演讲资料的基础上,就他们对美国学校体育考察的背景、内容、影响3个方面展开初步讨论。当时教育部门官派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加快和促进了中国学校体育的历史转型,其中包括学校体育思想的转变、课程内容的增加、对体育理论知识的重视和加强以及注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培育。

关键词: 美国学校体育;教育考察;北洋政府时期;历史转型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5-0086-05



Survey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 by the Education Officials in Northern Warlord Government Period

ZHOU Yat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Warlord government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sports once more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is to say, it ended imitating Japan and started to learn from the US. And the trend lasted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 entire Chinese modern sports.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background, content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educators' investig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ers' extensive study on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s and presentation material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at that time, the survey of the education official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change of physical educational concept, the increase of PE curriculum, the strengthening of spor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ethics.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the Northern Warlord government perio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美体育关系比较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不仅出现了大批学生留美的风潮,更有许多赴美专攻体育的留学生。同时,一大批具有体育特长的美国传教士也是在这一期间纷纷来华,组织成立中国最早的国家奥委会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其中,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也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美国对华态度的友好,还因为日本于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更引发了人们对原有军国民体育的反思。加之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推崇,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体育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即由原先较为紧密的中日体育关系转向较为友好的中美体育关系,并引发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再一次历史转型,从此美国体育文化占据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1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赴美考察的背景

在清末,国内派遣官员对外国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日本,如1898年受张之洞委派前往日本联络赴日学生入学的姚锡光,为近代官员赴日教育考察的嚆矢^[1]。而到了民国时期,这一传统逐渐转为以考察欧美教育为主,其中美国成为首选。

首先从美国方面来看,他们对中国态度的友好转变,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第二年,清政府被迫签署了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美国出于长远的打算,认为“教育可使中国政府安定与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富足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一旦留美学生成为北京领袖时,美国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2]于是美国

收稿日期: 2016-09-10

基金项目: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TY083),2015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5-127)。

作者简介: 周亚婷,女,河北石家庄人,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史。E-mail:zhouyating12@163.com。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作为接受赔偿的11个国家之一,首先于1908年开始退还庚款,用于设立清华园及选派留学生,试图培养未来的亲美精英。所以自1909年起,政府每年派遣100名留学生赴美,开启了美国留学热的先河。随即,聘请美国教师来华,以及邀请教育家杜威等人来华讲学等一系列举措,拉开了我们全面学习美国的序幕,其中包括教育部门官派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

其次是反日情绪的高涨。在中日关系史上,1898—1907年间,确曾存在着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10年发展,任达先生将它称之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3]。尤其是在教育上,我们几乎完全模仿日本。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4]所以“以日为师”只是权宜之计,“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4]这也导致了我们从一开始学习日本就不彻底,甚至是投机取巧。随后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更是加剧了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战败,美国的世界地位迅速上升。所以从晚清起提倡的军国民体育思想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美国民主与科学的体育思想对中国的全面渗透。

第三,国内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案书》中正式提出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口号。他甚至提出为了民主与科学,不惜流血牺牲。在这一情况下,一些关心教育的有识之士,解放思想,大力抨击军国民体育思想带给国人的危害。甚至说道:“军国民体育,不仅是自杀,简直是使活动的人变成了一种机械,一点性灵都不许他存在。”^[5]这导致了以强国强种为目的,而不注重学生健康的兵式体操课程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田径、球类和游戏项目为主的教学内容,建设以符合人体发展规律的体育课程。

2 赴美考察人员的特殊性

在学习美国的道路上有4种渠道和人群,分别为:一,选派留学生;二,官派教育考察人员;三,邀请美国教育家讲学;四,聘任美国教师。相比较于留学生、专家讲学和聘任美国教师,教育官员具有其他几类人群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第一,这些教育官员大多是学校的校长,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美国考察时获取的信息和资源更多。官派教育考察人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按时间顺序可大致分为4批。第一批,是由南开学校派出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赴美考察时间:1917年8月—1918年11月;第二批,是自费和教育部委派结合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时间:1918年4月—1918年12月;第三批,由教育部委派的12位教育官员,分别是前教育次长袁希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江苏省视学邹楫、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曾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谈锡恩、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杨若堃、江苏省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任诚、江苏省省立第四中学校长章钦亮、江苏省议会会员刘文辂、江苏省长公署第三科科长王天柱、江苏省中学校长长梓、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教员陈家麟^[6]。时间:1919年11月25日—1920年;第四批,由北京大学派出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时间:1920年11月24日—1921年9月。特别是在第三批教育部委派赴美考察学校体育时,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学校的部长接待,并为他们讲解学校概况和体育课程设置。如在参观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体育馆时,学校的接待主任劳宁(Leonard),曾详细向考察团介绍了欧柏林大学的体育卫生科专业。该专业“创始于三十五年前,男女两部同时成立,现女子部主任已任职三十五年自行辞职。新任者为三十五年前之学生,在此毕业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医科得有博士学位者也。男女两部教员各五人,其比赛等事之主任,均自校教员任之。”^[7]

第二,这些教育官员大多是既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的教育专家,对当时中国学校体育所反映出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对中国学校体育长期高度关注并对其有独到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见解。张伯苓是南开的创办者。有人说南开有名,一半得力于南开的教学与设备,一半得力于南开的体育,而南开的体育主要归功于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训练学生的方针中,我们看到了以下两条:“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8]张伯苓认为:惟有此“二者兼具,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8]他甚至还提出“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9]。范源濂对学校体育的主张,则更多的是要求培养学生和国民的尚武精神,所谓“不武者不足以国民”^[10],竭力鼓吹军国民体育。蔡元培对学校体育的理解则是所谓“新教育者,以体育、智育、德育并重”^[11],并强调学校运动会具有独特的教育作用。总之,他们对当时学校体育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助于将美国学校体育的思想理念和发展模式引进中国。

第三,直接赴美考察,可以身临其境,使这些教育官员对体育的感触更直接也更深入。体育和其他事物不同,只有身临其境,才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体育场馆之宏大、运动场景之壮观。例如他们看到的是“尤有奇怪者,每年炎暑之际,往往男女学生约赴海滨同作沐浴,或驾船行走,或雁行浮泳,或携手偕行,种种游戏不胜枚举,在吾人以为可笑,在美人亦成为普通之习惯矣”^[10]。这种现场的直接刺激,对他们回国后传播美国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考察美国学校体育的内容分类

在赴美考察学校体育期间,这些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官员走访了美国的大、中、小学,了解了美国学校体育的发展现状。其中涉及到了学校体育的卫生问题、场地与设施、课余训练与比赛、童子军训练这4个方面。

3.1 学校体育的卫生问题

美国的学校体育对于卫生问题非常注重,在考察人员报告中几乎开篇就会提到。如范源濂在报告中介绍:“至小学校中之于卫生,则任在何处皆非常注重”^[12]。他说:“美国对于小儿之卫生非常注重,入学时先行体格试验。”^[13]在民国八年(1919年)的欧美考察教育团记述中,更有对美国



学校强调体育卫生教育的详细描述：“一月十二日，参观维士康莘体育馆，与部长迥斯 J.E.Jones 君谈话……每一学生入学以后即备一纸，以填逐年所考验之体育成绩。考验所注重者三：(1)内脏(2)筋肉(3)各种动作机关。由上之考验，以区别体格之种类如次：(甲)可入各种运动之体格(乙)普通体格(丙)体质有缺点者。至于体育之实施得分，言之如次。”^[17]在欧柏林大学体育馆，考察官员甚至了解到他们已创办有本科的体育卫生系专业教育。

3.2 学校体育场地与设施

官派教育考察人员在美国考察学校体育时，无不感叹美国学校体育场地与设施的完备。“各学校皆有操场，有极宽大之体育室，室中设备完美，各式运动皆可在内行之。”^[18]有些学校甚至还建设了体育综合性场馆。如民国八年(1919年)的欧美教育团报告里，记述有美国维士康莘大学体育馆的详细介绍。“此场馆分为田径赛运动房、游戏池、体育室之一、体育室之二。田径赛运动房为平方一大间，其下周围为赛跑圈，每十二周为一英里。其上一端有围楼，楼上有练习竞漕之设备，以空气压力代水之抵抗，有学生作推桨之动作。闻冬季在此练习者共有一百五十人云。室内有跳高、跳远、掷球各种设备；游泳池在室内第一层，楼上为体育室；体育室之一，在第二层，宽一百二十呎，长一百五十呎，器械操、兵式操皆于此作之，枪械陈于四周壁际(午前十一时兵式操以后普通操)；体育室之二，在第三层，此室设备双杠、木马、天梯、吊环、球篮等，尤备楼板上以漆书号数成直线，学生先各编一号，受课时就其号而立，故不须点名而知某某未到”^[19]。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学体育馆在运动场馆上的投资和他们对综合体育场馆的设计理念。

3.3 学校体育课余训练与比赛

美国学校对学生的课余体育训练与比赛通常比较重视，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校内、校外体育比赛。例如维士康莘大学，校内有各种团体比赛活动。赛跑、蹴球、垒球、游泳、竞漕等。或以年级相对、或以科目相对，常分团比赛。此校最为擅长的是篮球和器械运动。凡比赛运动会会有来参观者，必须购票入场。在校外比赛，此款则由比赛之校分得之，以充将来比赛会费，校内比赛亦然。“本年蹴球比赛参观者有三万二千余人。耶鲁、哈佛两大学运动场，最广参加者往往达六七万人。”^[20]比赛得胜之球，“无虑百十，皆排嵌如匾额，陈于梁际，以激动后起。”在比赛中，他们尤为注重两点训练：“(一)对于领袖之服从；(二)对于团体之爱护。”^[21]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学校课余体育比赛，并不仅仅注重成绩，更在于培养人的道德和涵养寓于体育比赛活动中。

3.4 童子军训练

童子军训练在当时是一种新事物，故教育官员对美国的童子军训练表现出异常的关注，他们邀请哥伦比亚大学童子军训练主任，具体介绍了童子军的组织概况。其中包含了美国童子军组织之办法，主要有3点：一是组织从下而上、采民主制、容多数之意志；二是使权力分散而不集

中、以厚其进行之力；三是以市县为单位、派代表与总机关直接、无省界之可言。关于童子军管理之办法，主要强调统一和规范。如徽章、军服、成绩之量度法等，“全国皆一律，且国中亦承认本机关为国家事业机关之一。”^[22]此外，教育官员还特别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童子军队长训练科。“七时至七时十五分，童子军队中之成绩、图画照片之陈列；七时四十五分，伯克里君旅行一万四千哩至夏威夷之经验谈；八时零五分，读书时间之讨论；八时十五分，队教练；八时四十五分，童子军队之组织及管理法；九时零五分，结绳法；九时三十五分，童子军歌。司队教练者告余等曰：本夜之教练含(一)教练(二)互相介绍(三)鼓舞团体精神三种作用”。^[23]这是专门为全美培养童子军训练骨干的专业培训班，共培训12次课、每次课约2.5h。由于当时我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的张、徐两人也在其中，所以考察人员有机会详细记录了他们一次晚上的培训课内容。

4 对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考察回国后，一方面积极撰写考察报告，另一方面则到各地进行演讲，充分传播和展示了美国学校体育的办学理念和基本情况，对当时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学校体育思想的转变。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军国民体育思想一直是学校体育的终极目标及要求。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自身兴趣爱好，只是一味地强调“通过体育来强民强种，伸张中华之气。”^[24]而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考察后，却发现中美之间对体育的理解大相径庭。如“美国学生对于运动，绝不是勉强的，乃真是出于自然感、有兴趣。”^[25]并且他们经常参加一些赛球、游泳等运动项目。“赛球视为一种极重大之事，各处多有球场，大城市中赛球时，观者常数万人，入场券售至数元一张。胜负决定后，则电报四达，报纸风传，倾动远迩，其举喜好胜之风气，亦可于此见之矣。”^[26]又如游泳，在学校中是一门主要科目，如不及格不得毕业，反映了美国学校对体育的极端重视。

中美学生的体质差异，也引起了教育官员的注意。“吾国学生之在美者，他事皆不必下于人，独论及体育则不及人甚远。大概一千余人之中，体质能与同级强壮之美生相比者，恐难得数十人耳，足见吾人之体质太不如人矣！”^[27]然而，体育与学习和工作效率是紧密相关的，只有人的身体健康了，才有可能更好地投入学习和工作。“夫有健全之身体，然后有健全之精神。吾人徒羨欧美人学问之进步，工商业之发达，不知彼等之体质何等强壮，何等结实。岂吾人所能其什一者乎，人果体力强精神好，作事自尔精进，反是则畏首畏尾，绝无活泼之气象。作事何能进步。吾国人半皆病夫，宜其不耐烦，好争意气也，然则美国之注重体育，岂无故乎。”^[28]揭示了中国学生在体质上与美国学生的差距。

美国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理解，引发了国人对是否废除兵操以及学校体育的真正目的、价值与意义的广泛思考。如1919年江孝贤在长沙体育周报上发表《学校应否废止兵操？》，开篇即说道：“兵操应插入学校之课程乎？曰，



否!一定不可也,兵操乃军事学校中之专课,与普通学校何有哉!”^[17]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认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主义已不合于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18]并通过了《改进学校体育案》,第一条便是“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时间,实行二十分间体操,及课外运动。”^[19]最终导致了1923年学校体育彻底废除兵式体操课程,军国民体育思想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民主与科学体育思想。

第二,课程内容的增加。在学校体育中,美国的学校卫生也是非常注重的内容。因为“盖必求儿童之无病,然后体质能健壮;必身体健壮,然后能启发其知能,令其担负应尽之责任也。”^[20]所以每年新生入学前,美国学校都会有卫生方面的体检要求。在日常管理中,学校的卫生要求也很严格。例如,“凡学生每日到校时,有医员候于校门之内,遇有疾者立时不令上课”^[21]。这样做的结果是:“故该校中更绝无带病上学之生徒,闻其成绩亦特优美。”^[22]在学校卫生方面,美国还针对其他国家的人采取了一些特殊处理办法。“如意大利人、犹太人子女等,身体病弱者甚多,如不令其入学,是任彼等之病身,永无痊愈之日,且背教育普及之道;故仍准其入学,而另设一班以收容之。教员医员对于彼等皆特别注意,其食品宜何物以及分量之多少,皆由医员定之;每食后,必令在床上安睡若干分时,方许起作他事。其结果则入学三星期后体重若干,五星期后又增若干,十星期后又增若干,功效甚为显著。更有露天学校者,乡间即在野地,城市则在屋顶之上,专为有肺病之学生而设。盖取能吸新鲜空气,以医其肺病也。凡有病之学生,功课常较常儿为少,盖有病之人,不能如健康者之耐劳,固生理不能解免之定则也。”^[23]这里看到的是美国学校对于学生卫生状况的因材施教,其实也向我们传达了美国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即每一个学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去培养他们。

1923年,“壬戌学制”颁布的第二年,《课程标准纲要》中正式将“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课时比重和授课内容。小学体育课程占总学时的10%;初中体育课程为16学分(每半年度每周上课1h为1学分,内含生理卫生4学分),占必修课总学分(164学分)的9.8%;高中体育课程为10学分(含卫生法、健身法),占公共必修课总学分(64学分)的15.6%,占毕业总学分定额(150学分)的6.7%^[20],其中生理卫生、卫生法、健身法在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并未提到。在教材内容上,体育课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要教材;在教学方法上,开始推行“三段教学法”,就是把一堂课程分为准备运动、主运动、整理运动3个阶段,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体育课的“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有一定的相似性,更加符合人的生理活动变化规律。

第三,对体育理论知识的重视和加强。体育运动在倡导人人参加的同时,还需要用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因为只有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这就需要专门的学科去研究运动解剖、生理等人体科学方面的知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官员曾详细记述有美国学校对于

人体科学等方面的实验室建设。例如芝加哥青年会大学体育馆里就有解剖室、细胞实验室和生理化学微生物实验室。其中解剖室内“正解剖死尸系教授体育家数人,专研究筋肉与骨骼结构及纤维神经种种。以为教授体育之基础。教授体育研究解剖为该校特色。据称初办时因非医学死,体颇不易得,现在人知,其为实心研究卫生,无何困难也。本室有极细人体各图。”^[24]在细胞学实验室里,“内有蛙一正在试验,去其脑钉之木板上以通电之针插入神经。一方发电则蛙体即动。视震动时间之长短,以考血液内废物之多少。”^[25]这些考察,影响了我国当时体育专业人员的培养规格。如一些体育专修科学校里,也陆续出现了类似应用解剖学、生理学等科目。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们对于体育科学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论述体育科学的文章和专业书籍相继问世,大大地提高了体育科学知识传播的速度。如192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运动生理》著作,书中对运动生理学有了详细的分类并就运动及于血液之影响、运动时心脏作业之增加、呼吸运动生理、运动及于消化器之影响、骨运动生理、脊柱、关节运动生理、运动之及于肌肉练习之影响与肌练习生理、运动之及于体温之影响、运动之及于皮肤之影响、运动之及于尿之影响、运动与神经系统、疲劳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从宏观上讨论体育问题的社会科学专著,共分总论、发育论、运动论、卫生论、实施方法论5个部分。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主编的《体育季刊》,于1922年由麦克乐创办,内容以介绍体育理论和科学知识为主。1923年12月第二卷第四期起,增辟卫生专栏,由中国卫生会编辑。从第三卷第一期起,改名《体育与卫生》。1925年起,《体育与卫生》并入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杂志内,每年出两期体育卫生专号。

第四,注重对运动员道德修养的培育。随着田径、球类、游戏等项目纳入中国的体育课堂教学内容,和学校体育竞赛的进一步开展,当时在竞技体育领域出现了锦标体育、选手体育等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的现象。一些学校甚至还用金钱去雇佣校外的运动健将去参加比赛,而主办运动会者,又不惜花费重金去设置奖项,来引诱青少年。这种现象导致一些学校在培养运动员期间,只看重成绩,不重视对他们道德水平的要求。正如袁希涛在1921年的欧美教育状况(续)演讲中说道:“体育要点,当注重全体学生,不在少数之选手。我国近数年亦颇注重体育,各学校有与他校比赛,优胜者非常有待之,乃或功课欠良、操行平常,校中从宽不问,其人亦傲然自足,颇为人所讥病,余初亦无补救法。”^[26]但是他到了美国的维斯康华体育馆,却发现了不一样的情形。这所学校对比赛选手有着严格的资格要求,并且“书成条件列于广场兹录以备考……(1)须本校学生。(2)须入学实验资格齐备。(3)须入学一年以后。(4)每门学业成绩须有十分之七及格。(5)平均学业成绩须有百分之七十七及格。(6)每周须有十五小时之受业。(7)须预备得学位。(8)如有不及格课程须补习完竣。(9)品行须无缺点。(10)未受过金钱之奖励”^[27]。这10条内容反映了“外国于体育中养成德育,不专以胜负为荣辱”^[28]的体育价值观



念,提示我们在日后的学校体育竞赛中,应当注重培养运动员的道德修养。

天津的南开学校在1925年《南开周刊》中提出运动员在场上应该表现出一种“仁侠的精神”。所谓“仁侠的精神”就是做一种运动,乃是为身体和心灵的愉快并增进团体的利益,并无丝毫别的目的存乎其间;仁侠运动员的精神是包括一种高尚义气的精神,诚实公平的态度,有礼貌、有忍耐、有谦逊、有节制的生活。仁侠运动员看待品格,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胜固可喜,败亦无伤,而且正当的批评也不一定以胜利为好,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所以提出仁侠运动员资格的标准,即:“(甲)普通的标准。(1)对于本队、敌队及大众面前须时时表现义气、诚实、公平、谦恭,且有节制的态度。(2)必须以运动的规则,为两方比赛的协定。最高等的运动员除了靠自己优等运动的技能和力量胜人外,并不求别种的利益。(3)不可在来宾面前自炫其能,要求别人的喝采,虽遇参观人喝采自己尤须谦抑。(乙)个人的标准。(4)须抱纯粹游乐主义。(5)不求一切例外的优待。(6)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7)勿因失败而气馁,勿因胜利而矜夸。(8)始终遵守运动规则,服从本队队长及教练员的指挥。(丙)对于本队的标准。(9)热心辅助本队的同伴,维持本队所规定的程序。(10)诚心谨守一切训练的条件。(11)牺牲自己的荣耀,求全队的胜利。(12)时时顾全团体的协力。(13)队员应当和衷共济,不可发生意见。(14)同队队员如有错误,应当婉言劝导,不可斥责。(丁)对于敌队的标准。(15)皆应友爱相待,恭敬有礼。(16)应具容忍的度量。彼队占胜,应加庆贺,不可嫉妒;我队占胜,应当谦恭,不可表示骄傲的态度。(17)比赛时须保持光明磊落的态度,虽时或使用谋略,但不可用背理欺诈的方法。(18)无论敌队之公道与否,自己切不可用不公道的行为报复效尤。”^[23]从以上标准可以看出,注重对运动员道德修养的培育,也逐渐成为后来中国学校体育的普遍要求。

5 结语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对美国学校体育的考察,不仅在中美体育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成为研究中美体育关系史的又一个视角,而且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后来发展,特别是学校体育的进步与转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清朝末年的学校体育还主要停留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23]的宗旨上,停留在强兵、强种、强国的军国民体育理念上,那么,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员赴美考察后的中国学校体育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仅教育的宗旨变成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24],且在具体的体育课程教学中,也广泛采用田径、球类和游戏一类的近代西方体育内容,从而使学校体育真正开始了向教育和人本

参考文献:

[1] 吕长顺.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3.

- [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
- [3]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
- [4] 周洪宇.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200,200.
- [5] 朱剑凡.军国民体育的结果[A].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388.
- [6] 王贺.赴美教育考察报告对“壬戌学制”的影响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13-14.
- [7] 刘文格、陈宝泉等.(八年)欧美考察教育团报告(美洲之部)·第七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6,1,1,4-5,3,7,5-6,5-6,3-4.
- [8]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第2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4,4.
- [9] 张伯苓著,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258.
- [10] 范源濂.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A].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2007:746,746.
- [11] 蔡元培.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A].蔡元培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79.
- [12] 范源濂.调查美国教育报告[A].范源濂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158,164,164,158,158,158,158-159.
- [13] 范源濂.赴美调查教育之情形[A].范源濂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171,163.
- [14] 佚名.考察欧美教育后之记载(续六日)[N].申报(上海版),1920-7-16.
- [15] 缪律.三代爱体育 - 访著名作家徐迟[N].新体育,1983(3):19.
- [16] 野云.今日北大两大集会·蔡校长之演说[N].申报(上海版),1921-9-28.
- [17] 江孝贤.学校应否废纸兵操.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国家[A].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体育史料第17辑)[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54.
- [18] 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议联合会议决案[J].教育杂志,1919,11(11):52.
- [19] 改进学校体育案.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A].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9.
- [20] 王华倬.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4.
- [21] 佚名袁希涛君讲演欧美教育状况(续)[N].申报(上海版),1921-2-2.
- [22] 张辑五.南开之运动[J].南开周刊,1925(1):8-9.
- [23] 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附上海[A].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44.
- [24]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326.

(责任编辑:杨圣韬)